

改革开放使我更坚定于基础课教学

生科院退休教授周德庆

改革开放后，我国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，从此社会更加稳定，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，“臭老九”成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，大家可以更安定地学习和工作，并可享受以往不敢想象的出国进修等的安排。

我从小相信“终生掘一井”和“上帝的忠告”（大意是“上帝”只允许常人在一生中至多成就一件值得称道的事）之类稳健型说教，期望自己一生能平平稳稳地干好一件事，按照当前的说法，就是要追求“工匠精神”。40年前的改革开放，消除了不断搞斗争、搞运动等的折腾，接着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大困难——夫妻分居（14年）、“爸兼妈”也如期解决了。

当时，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：是打算争取出国进修，还是照旧留在国内工作？是继续安心于基础课教学还是趁机转向以科研为主？我的老师王鸣岐教授曾希望我先出国进修，盛祖嘉教授也希望我转到他的研究室搞科研并争取出国进修一下。经我慎重考虑后，感到自己的条件、家庭的困难，以及自己长期从事基础微生物学的教学经历和兴趣，最终决定还是窝在国内，终生不离基础课教学。

在各级领导和师长的关心支持下，在历届学生的配合下，我坚守“终生掘一井”的原则，以“三书”（读书、教书、写书）为重点，一辈子不动摇，最终也算取得了一份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效果。

第一，在人才培养方面。先后开设了以微生物学基础课为主的10余门课，学生除本科生外，还有硕士生、大专生、中专生和广播电视大学生等；指导过12名硕士生和约30名进修教师；为兄弟院校开设过微生物学（上海科技大学，1986），医学微生物学（上海中医药大学七年制学生，1993~1995），以及在退休后曾担任浙江万里学院生命科学系主任等职。

第二，在教材建设，工具书、参考书出版以及论文发表方面。为本专业教材的系列化、成套化做出了显著成绩：如《微生物学教程》（独撰，已出3版，发行量超80万册，正在写第四版），《微生物学实验教程》（主编，已出3版，正在写第四版），《微生物学：精要·题解·测试》（与徐士菊合编），《微生物学实验手册》（主编），以及《微生物学词典》（与徐士菊合编，是国人首编的专业词典，收词约5000条，130余万字）等，由此，使我专业的教材建设早已步入同行前列；参编（译）了大量专业参考书、工具书和科普书，再包括上述教材，总数达58本（版）：如数校合编的《微生物学》（参编第一至八版），《微生物生理代谢实验手册》（两主编之一）和《生物学试题库（光盘版）》（分主编）等；工具书类如《辞海》（第六、七版），《大辞海·生命科学卷》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（生命科学卷，第三版，出版中），《微生物学名词》（第一、二版）和《科学家大辞典》等，另外还有科普书近10本；共发表了45篇教学论文或文章，如《知技力情——提高讲课质量四要素》和《八旬教师谈“评教八率”》（待发表）等；曾发表科研论文21篇，综述论文18篇。

第三，在为全国同行服务方面。1980年暑假，我曾协助王鸣岐教授在我校举办了“现代微生物学专题讲习班”，由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华裔微生物学家仇大健副教授主讲，全国各大学教师160余人参加，影响深远；接着由我们发起，联合多所高校举办两年一届的“全国微生物学教学研讨会”，我连续参加了7届；另外，曾任教育部高校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微生物学教学指导组组长（2届），全国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以及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等，为全国同行做了许多服务工作。

第四，在社会评价和获奖方面。曾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，校内奖10余项，如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，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；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，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等。

由上可知，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成全了我“终生掘一井”的愿望，今后，若领导能更关心这类“掘井人”，相信就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去“掘井”，从而学校和社会一定会涌现出更多、更有源头活水的“深井”。

生活中的一大困难——夫妻分居(14年)、“爸兼妈”也如期解决了。

当时，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：是打算争取出国进修，还是照旧留在国内工作？是继续安心于基础课教学还是趁机转向以科研为主？我的老师王鸣岐教授曾希望我先出国进修，盛祖嘉教授也希望我转到他的研究室搞科研并争取出国进修一下。经我慎重考虑后，感到自己的条件、家庭的困难，以及自己长期从事基础微生物学的教学经历和兴趣，最终决定还是窝在国内，终生不离基础课教学。

在各级领导和师长的关心支持下，在历届学生的配合下，我坚守“终生掘一井”的原则，以“三书”（读书、教书、写书）为重点，一辈子不动摇，最终也算取得了一份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效果。